



国际法院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研究

何志鹏 周 萌*

摘 要：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主要由《国际法院规约》第 63 条和《国际法院规则》第 82 条加以调整。在已对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可受理性作出裁定的 6 个案件中，国际法院主要基于附带程序的基本属性，以及《国际法院规约》第 63 条规定的缔约国身份、限于条约解释的参加目的、判决对参加国具有同等拘束力等方面裁定参加声明的可受理性。同时，参加声明还需满足修订后的《国际法院规则》第 82 条的形式要求和时限要求。第三国参加诉讼程序包括国际法院、双方当事人和参加国 4 方法律主体，涉及原告国与被告国、当事国与参加国、国际法院与参加国 3 对法律关系。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目的应限于对主程序所涉争议条约的解释范围，当参加国的参诉目的难以分辨时，可借助参加声明的高频次引用内容和引用用意加以推断。在近期的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应对第三国所提交的参加声明进行更为实质的判断，尤其是在参加国采取“积极合作”策略的情况下，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不应损害当事方平等和良好司法原则。综合来看，当事国对第三国参加的态度属于重要但非决定性因素，国际法院仍是决定参加是否具有可受理性的主体。一方面国际法院对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性规则的修订顺应了“公益化”趋向，另一方面也应兼顾国际司法程序的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

关键词：国际法院 参加程序 条约解释型参加 附带程序 可受理性

一 问题的提出

国际司法机构的第三国参加（intervention）程序是指第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而参与他国正在进行的待决诉讼。^①《国际法院规约》（下称《规约》）第 62 条和第 63 条分别规定了“法律利益型参加”和“条约解释型参加”两类第三国参加程序。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将前者称为“基于法院许可的参加”，将后者称为“作为权利的参加”。^②琴肯（Chinkin）^③和罗森（Rosenne）^④将两类参加

* 何志鹏，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萌，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05）的阶段性成果。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援引网络资料的最后访问时间统一为 2025 年 2 月 25 日。

① V. S. Mani,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Procedural Aspect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0), p. 248.

② Gerald 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Grotius Publications, Volume II, 1986), p. 550.

③ Christine Chinkin, *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Clarendon Press, 1993), p. 150.

④ Shabtai Rosenn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20 - 1996*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3rd edn, 1997), p. 1482.

程序分别称为“裁量性参加”和“作为权利的参加”。另有学者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类参加程序的区别。^① 两类参加程序的关系最早由常设国际法院时期的“温布尔登号案”（*S. S. “Wimbledon”*）加以揭示。在该案中，波兰最初依据《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 62 条申请参加，后经英国建议，改为依据第 63 条宣告参加。常设国际法院认为，该案涉及对《凡尔赛和约》某些条款的解释问题，波兰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之一，鉴于上述确凿的事实，常设国际法院裁定准许授予波兰依据第 63 条参加的权利。^② 就共性而言，两类参加程序均为保护参加国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法律利益型参加强调参加国的法律利益受某一案件判决的具体影响，而条约解释型参加强调参加国的法律利益受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多边条约解释的影响。^③ 因此，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只适用于条约，而不及于国际法的其他法律渊源。

迄今为止，国际法院（下称法院）共有 7 例案件涉及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除法院暂未对“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加沙地带的适用案”（*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下称“南非诉以色列案”）作出裁定外，其余 6 例法院均以判决或命令形式裁定参加声明可以或不可以受理。^④ 近年来，关于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国际法院实践遽然拓展，国际法院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通过了新修正案，修订《国际法院规则》（下称《规则》）第 81 条第 1 款、第 82 条第 1 款以及第 86 条第 2 款中有关第三国申请参加或宣告参加的时限与参与口头程序提出意见的相关规定，修正案于 2024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具体而言，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时限受《规则》第 82 条调整，被允许参加诉讼的国家口头程序提出意见的权利受第 86 条调整。

国外对参加程序的系统研究发轫已久。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国外诸多学者就开始了对第三国参加程序的专项研究，但 21 世纪后，碍于国际法院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实践的长期停滞，研究成果多体现为围绕“南极捕鲸案”（*Whaling in the Antarctic*）进行个案研究。而国内的研究多在国际司法程序、国际法院司法实践的条约解释等议题中简要提及第三国参加程序，鲜有对第三国参加程序的专项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国际法院涉及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案件，分析法院裁定参加声明是否可以受理的判理，并基于参加国、双方当事国和国际法院 4 方主体间的 3 对法律关系，结合国际法院最新实践，尝试深入阐释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

① [日] 杉原高嶺：《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王志安、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3 页。

② See *Case of the S. S. “Wimbledon”*, Question of Intervention by Poland, PCIJ, Series A, No. 1, p. 13.

③ Shabtai Rosenne,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3), p. 73.

④ 国际法院涉及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 7 个案件的案件名、当事国、宣告参加的国家（地区）以及裁判时间和形式和结果为：（1）“阿亚·德拉托雷案”，1951 年以判决形式裁定古巴共和国的参加可以受理；（2）“在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1984 年以命令形式裁定萨尔瓦多共和国的参加不可受理；（3）“请求按照国际法院 1974 年 12 月 20 日关于核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案）的判决第 63 段审查局势”，1995 年以命令形式裁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 4 国的参加不可受理；（4）“南极捕鲸案”，2013 年以命令形式裁定新西兰的参加可以受理；（5）“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的灭绝种族罪指控案”，2023 年以命令形式裁定除美国的参加声明外，其余 31 份参加声明可以受理（32 份参加声明共涉及 33 个国家）；（6）“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冈比亚诉缅甸案”），2024 年以命令形式裁定马尔代夫的参加声明和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瑞士和英国等 6 国联合声明部分可以受理；（7）“南非诉以色列案”，按时间先后申请或宣告参加的有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利比亚、墨西哥、巴勒斯坦、西班牙、土耳其、智利、马尔代夫、玻利维亚、爱尔兰、古巴和伯利兹等 13 个国家（地区）。

二 对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可受理性判断

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主要受《规约》第 63 条和《规则》第 82 条、第 83 条、第 84 条和第 86 条调整。《规约》第 63 条规定：“凡协约发生解释问题，而诉讼当事国以外尚有其他国家为该协约之签字国者，应立由书记官长通知各该国。受前项通知之国家有参加程序之权，但如该国行使此项权利时，判决中之解释对该国具有同样拘束力。”而且按照《规则》第 84 条第 1 款规定，除非根据案件情况另有决定外，法院应优先决定是否准许（grant）依据《规约》第 62 条提出的参加申请（application），或依据《规约》第 63 条提出的参加声明（declaration）是可受理的（admissible）。

（一）条约解释型参加应符合附带性要求

两类第三国参加程序均属于“附带程序”（incidental proceeding），所谓附带程序主要用以处理主程序以外的问题，属于不普遍适用的附加程序。^① 具体而言，附带程序必须是已在国际法院及其分庭审理中的案件所附带的法律程序，而不能是将该案件转变为涉及不同当事国的新案件。^② 参加程序的附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参加声明应当与待决程序的主题事项相关联。在“阿亚·德拉托雷案”（*Haya de la Torre*）中，国际法院裁定受理古巴的参加声明时指出，“每一项参加都是案件程序的附带事项，参加声明只有在法律上与待决事项的主题相关时，才具有这种性质”。^③ 第二，参加声明是否可以受理取决于主程序所处诉讼阶段。如在“在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下称“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法院认为就当前诉讼阶段（管辖权阶段）而言，萨尔瓦多的参加声明是不可受理的。^④ 第三，无论第三国是依据《规约》第 62 条申请参加，还是依据《规约》第 63 条宣告参加，国际法院对主程序所涉争端具有管辖权与案件本身具有可受理性是参加程序的先决条件。如在“核试验案”（*Nuclear Tests*）中，法院认为斐济根据《规约》第 62 条申请参加的前提是法院对该争端具有管辖权，并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该争端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可受理的，故而法院决定推迟考虑斐济的申请。^⑤ 第四，主程序终止时，作为附带程序的参加程序也随之失效。如在“核试验案”中，因法国已经承诺了不再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法院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诉请已

① 王林彬：《国际司法程序价值论》，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 页。

② See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0, p. 134, para. 98.

③ *Haya de la Torre Cas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51, p. 76.

④ 1984 年 5 月 10 日关于临时措施的命令中，法院曾指出书面程序阶段应首先处理法院是否对该争端具有管辖权和尼加拉瓜申请是否可予受理。法院最终在 1984 年 11 月 26 日的判决中确认了对该争端的管辖权，并认定尼加拉瓜诉美国的请求书是可以受理的，法院驳回萨尔瓦多的参加声明时尚未确认对该争端具有管辖权。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4 October 1984, I. C. J. Reports 1984, p. 216.

⑤ See *Nuclear Tests Case (Australia v. France)*,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Order of 12 July 1973, I. C. J. Reports 1973, p. 321; *Nuclear Tests Case (New Zealand v. France)*,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Order of 12 July 1973, I. C. J. Reports 1973, p. 325.

不再有任何目的,因此没有必要对斐济的参加申请作出决定。^①同理,国际法院裁定新西兰于1995年8月21日提出的“按照国际法院1974年12月20日关于核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案)的判决第63段审查局势的请求”不属于第63段的规定范围,最终裁定驳回新西兰的申请,因此作为附带程序的澳大利亚参加申请以及4个太平洋岛国参加申请和参加声明同样被驳回。^②

(二) 参加国是主程序所涉争议条约的缔约国

国际法院在“南极捕鲸案”的判决理由中首先指出,《规约》第63条规定的参加属于附带程序,是对权利的行使,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有限目的是作为非当事国的第三国因是诉讼中存在解释争议的条约缔约国,允许其向法院提交对该条约的解释。^③然而法院进一步解释到,缔约国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使声明国自动获得参加国地位,参加权利仅在声明符合《规约》第63条时存在,同时法院还必须审查声明是否满足《规则》第82条规定的条件。^④第63条仅适用于条约,而不适用于国际法的其他法律渊源。^⑤《规约》第63条对“协约”一词并无定义,对此汉布罗(Hambro)主张,第63条的“协约”一词必须与《规约》第38条中的“协约”含义相同。^⑥根据《规约》评注,《规约》第38条中的“协约”一词通常指向《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称《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a项中的“条约”,^⑦也即《规约》和《规则》对争议条约的类型和性质并未作出限制。对《规约》第63条所使用“签字国”一词加以文义解释,宣告参加的主体应是某一条约的缔约国。哈德森(Hudson)认为缔约国通常应是要求一国批准条约。^⑧国际法院曾释明,《条约法公约》对条约法的编纂澄清了某些争议,即没有理由认为缔约国有不同于一般国际法的含义,^⑨《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g项将条约的“当事国”定义为“同意承受条约拘束及条约对其有效之国家”。与有关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的所有问题一样,缔约国的资格应在宣告参加之日予以确认。例如新西兰最初于1949年批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69年宣布退出,后又于1974年重新加入,这一系列事实并未影响其于2012年宣告参加“南极捕鲸案”的资格,也即第三国在宣告参加之日具备主程序所涉争议条约的缔约国身份即可。

① See *Nuclear Tests Case (Australia v. France)*,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Order of 20 December 1974, I. C. J. Reports 1974, p. 530; *Nuclear Tests Case (New Zealand v. France)*,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Order of 20 December 1974, I. C. J. Reports 1974, p. 535.

② See *Request 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63 of the Court's Judgment of 20 December 1974 in the Nuclear Tests (New Zealand v. France) Case*, Order of 22 September 1995, I. C. J. Reports 1995, p. 306, para. 67.

③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I. C. J. Reports 2013, p. 6, para. 7.

④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I. C. J. Reports 2013, pp. 6-7, para. 8.

⑤ See Alina Miron and Christine Chinkin, “Article 63”, in Andreas Zimmermann *et al.*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2019), p. 1758.

⑥ See Edvard Hambro, “Intervention under Article 63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Roberto Ago, Mario Giuliano and Piero Ziccardi (eds.), *Comunicazione e Studi*, Vol. XIV (Giuffrè, 1975), pp. 388-389.

⑦ Alina Pellet and Daniel Müller, “Article 38”, in Andreas Zimmermann *et al.*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2019), p. 890.

⑧ Manley O. Hudson,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 Treatis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4), p. 371.

⑨ 如国际法院在“拉格兰案”(LaGrand)中曾适用《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规约》第41条。*LaGrand (German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1, p. 501, para. 99.

随着两类参加司法实践的丰富,国际法院审查参加主体的资格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某一国家同意受条约拘束,但条约尚未生效。例如“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a / Malta)*]中,虽然彼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海洋法公约》)尚未生效,但当事方并不认为《海洋法公约》与诉讼程序无关。^①按照《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f项的定义,此时该国不是“当事国”而是“缔约国”,而且按照《条约法公约》第18条,缔约国负有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之义务。虽然在“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中,意大利基于法律利益的参加未获准许,^②但鉴于条约生效前,法院对条约的解释仍会对嗣后实践有影响,延伸出的问题是条约解释型参加是否也适用于尚未正式生效的条约,目前国际法院尚未有司法实践涉及这一情况。

第二,未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为国家的主体是否可以基于条约解释参加诉讼。例如在“南非诉以色列案”中,巴勒斯坦同时依据《规约》第62条和第63条参加诉讼,两项参加请求既是累积的又是独立的,并且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的法律问题。^③巴勒斯坦依据第62条申请参加诉讼时,并未具体说明是基于当事国身份还是非当事国身份参加诉讼。^④依据第63条宣告参加诉讼时,巴勒斯坦强调其已于2014年加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下称《灭种罪公约》),应将其作为灭绝种族的亲历受害者加入到解释《灭种罪公约》的参加程序中。^⑤就巴勒斯坦而言,按照《规则》第82条第5款a项只需“自认为”(consider itself)是缔约国即可,但就国际法院而言,无法避免地要回应巴勒斯坦的国家主体资格问题。

此前法院一直有意回避该问题,2024年“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Legal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Israe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也并未实质性回应此问题。对此,戈麦斯·罗夫莱多(Gómez Robledo)法官在他的个人意见中对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沉默深表遗憾,并通过详细论证主张法院应将巴勒斯坦视为国际法上的“国家”。^⑥本文认为,在“南非诉以色列案”中,国际法院很可能继续回避这一问题。鉴于巴勒斯坦是《灭种罪公约》的缔约方,书记官长已按照《规约》第63条第1款通知巴勒斯坦,而并未澄清其根据一般国际法的国家地位问题。而且按照《规则》第82条第5款b项,国际法院需要核查参加声明是否包括参加国认为有解释争议的条约的具体条款,以及《规则》第82条第5款c项要求参加国是否

① See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a/Malt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5, pp. 29 – 30, paras. 26 – 27.

② See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a/Malt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4, p. 28, para. 47.

③ Se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Intervene and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Submitted by Palestine, 3 June 2024, paras. 1 – 2.

④ 国际法院在1990年“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判决中将依据《规约》第62条的法律利益型参加分为以当事国身份的参加和非以当事国身份的参加两种形式。第三国以当事国身份参加诉讼时,除需符合参加目的和“可能受法律判决影响的法律性质的利益”的一般构成要件外,还需满足“管辖权关联”(jurisdictional link)的特别构成要件。See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0, pp. 134 – 135, para. 99.

⑤ Se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Request for Intervention and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paras. 40, 46.

⑥ *Legal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Israe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Advisory Opinion of 19 July 2024,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ómez Robledo, paras. 1 – 17.

已提出其主张的对上述争议条款的解释，巴勒斯坦的参加声明对《灭种罪公约》争议条款的解释显然是不明确的。事实上，“阿亚·德拉托雷案”就体现出法院对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最终监督职能。^①“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法院不受理萨尔瓦多的参加声明也并非局限于形式上的审查。这意味着法院对参加声明的可受理性具有决定性权力，若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参加声明不符合可受理的条件，其有权拒绝受理。

（三）参加目的仅限于就条约解释提出意见

“南极捕鲸案”的法院命令及法官声明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受理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条件。

第一，法院明确表示新西兰的参加并不赋予其当事国的地位，^②即条约解释型参加的参加国不享有《规约》和《规则》赋予当事国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在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中，参加国与当事国之间无需存在“管辖权关联”，当事国与参加国同属争议条约缔约国的事实就足以证成二者之间的联系。

第二，鉴于条约解释型参加的范围和后果有限，新西兰在宣告参加“核试验案”的参加声明中曾言明，其参加限于主诉讼程序存在争议的条约解释范围，而不扩大至对案件的一般参加。^③法院也支持新西兰不涉及对《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解释之外的澳大利亚和日本间争端的“其他方面”，而且这种参加不能影响当事方的平等。^④鉴于日本在书面意见中提请法院注意当事各方的平等性，^⑤小和田（Owada）法官认为，法院命令仅依据《规约》第63条的参加范围就断定这种参加不会影响争端各方的平等，这是不合逻辑的推论。^⑥法院对“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的判决表明，当参加请求有损基本法律原则（包括当事国平等原则）时，即便参加请求符合《规约》规定的条件，法院也有权驳回这一请求。^⑦

法院除限制基于条约解释型参加的范围与后果之外，对条约解释本身也有要求。在“阿亚·德拉托雷案”中，法院认定只有参加声明在法院认定的争端主题事项范围内，才可被裁定为可以受理。^⑧加亚（Gaja）法官在“南极捕鲸案”中也曾指出，法院本应阐明和确定对《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的解释与案件裁决之间的相关性。^⑨申言之，案件中仅提及该公约是远远不够的，对公约的解释必须以某种形式直接决定案件的裁决结果。这同时也是参加程序附带性质的逻辑结果，参加须保

① See D. W. Greig, “Third Party Rights and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92) 32 (2)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5, p. 310.

②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I. C. J. Reports 2013, p. 9, para. 18.

③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New Zealand, p. 6, para. 7.

④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I. C. J. Reports 2013, p. 9, para. 18.

⑤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Written Observations of Japan on the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para. 8.

⑥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Declaration of Judge Owada, I. C. J. Reports 2013, p. 12, para. 3.

⑦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Declaration of Judge Owada, I. C. J. Reports 2013, p. 11, para. 2.

⑧ See *Haya de la Torre Cas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51, p. 76.

⑨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Declaration of Judge Gaja, I. C. J. Reports 2013, p. 41.

持在提交法院的主程序所涉争端主题事项的范围内，不能因参加而产生新的争端。在“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的灭绝种族罪指控案”（*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下称“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中，亚伯拉罕（Abraham）法官详细区分了作为说理要素以附带形式解释多边条约与解释本身就是争端主题事项这两种情况，并认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规约》第 63 条第 2 款才能产生全部效力。^①

关于参加国能否在管辖权阶段宣告参加，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法院审议萨尔瓦多的参加声明时认定，萨尔瓦多已预设法院对争端有管辖权，且萨尔瓦多并未表明参加与待决诉讼的主题事项有关，最终法院决定在当前诉讼阶段（管辖权阶段）不受理萨尔瓦多的参加声明。^②对于《规则》第 63 条是否区分诉讼阶段，劳特派特（Lauterpacht）认为，“凡协约发生解释问题”这一措辞表明第 63 条适用于案件审理的所有阶段，管辖权阶段的参加也应是允许的。^③施韦贝尔（Schwebel）法官反对将萨尔瓦多的参加声明推迟至实质阶段审议，并坚持认为，除法院可能将萨尔瓦多依据《规约》第 36 条第 2 款“任意强制管辖条款”作出的声明排除在可受理的范围之外，萨尔瓦多在管辖权阶段的参加声明应是可以受理的。^④

本文认为，鉴于《规约》第 63 条并未区分条约类型或条约条款的类型，对于法院能否受理参加国在管辖权阶段的参加应分情况讨论。

第一，法院的管辖权建立在当事国就争端解决订立的特别协定之上，这类特别协定通常由某一多边公约的缔约国为就该公约项下争端的解决而订立，主要规定争端解决的程序及适用争端解决程序的条件，但这些条款并不涉及实质性权利和义务。若某一多边公约缔约国已将该公约项下的争端提交至国际司法机构，其中某一方案件当事国援引此类特别协定，法院可以根据《规则》第 43 条第 1 款通知该公约的其他缔约国，非当事国的公约缔约国可以第三国身份参加诉讼，并有权就特别协定中与管辖权争议有关的条款作出解释。在此种情况下，当事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以第三国身份在管辖权阶段参加诉讼应是可以受理的。例如在“印度洋洋划界案”（*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的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中，法院认定按照《海洋法公约》第 282 条，肯尼亚和索马里的任择条款声明已构成“以其他方式”对在法院解决有关解释或适用《海洋法公约》争端达成的特别协定，因此法院的诉讼程序应“代替”《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程序而适用。^⑤鉴于法院在该案中对《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的解释关乎所有缔约

①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Judge Abraham, I. C. J. Reports 2023, pp. 387 – 388, paras. 9 – 10.

②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4 October 1984, I. C. J. Reports 1984, p. 216.

③ 劳特派特认为，在诉讼的管辖权阶段，就《规约》的解释和《规约》第 36 条第 2 款任意强制管辖作出的接受管辖的声明而言，参加应是被允许的。See *Certain Norwegian Loans (France v. Norwa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Sir Hersch Lauterpacht, I. C. J. Reports 1957, pp. 63 – 64; See *Interhandel (Switzerlan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24 October 1957,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Sir Hersch Lauterpacht, I. C. J. Reports 1957, p. 120.

④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4 October 1984,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Schwebel, I. C. J. Reports 1984, p. 242.

⑤ 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Somalia v. Keny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7, p. 50, para. 130.

国的利益,^① 因而当法院被要求裁决超出“印度洋海洋划界案”的管辖权争议时, 除肯尼亚和索马里的其他缔约国可以第三国身份在管辖权阶段参加诉讼。

第二, 在管辖权阶段, 如果某一“争端解决条款”的解释不能与对公约其他条款的解释相隔离, 即对法院管辖权的判断不能完全脱离于案件事实和实质内容, 那么, 在法院对其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之前, 参加国的参加声明针对原告国指控的违反行为是否属于法院属事管辖权的范围发表意见是不适当的。就管辖权阶段而言, 此时受理参加国的参加将无法避免涉及案件实质问题, 故而法院应认定此情况下参加是不可受理的。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中, 法院认定所有参加声明至少部分涉及《灭种罪公约》的某些条款, 而在当前诉讼阶段对这些条款的解释存在争议。^② 因此法院得出结论, 俄罗斯对管辖权阶段不可受理参加声明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相应地, 俄罗斯对参加不能涉及对《灭种罪公约》第9条“争端解决条款”的解释所提出的异议也未获支持。^③ 但是薛捍勤法官认为, 由于对《灭种罪公约》第9条“争端解决条款”的解释必然触及实质阶段, 因此该案中参加国在管辖权阶段的参加声明应被裁定为不可受理。^④

本文认为, 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的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中, 《灭种罪公约》第9条与在该案的管辖权阶段判定当事国间是否存在“争端”、法院是否享有属事管辖权均密切相关。^⑤ 在判定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关于《灭种罪公约》的争端后, 法院将争端界定为乌克兰是否从事灭绝种族行为与俄罗斯是否违反《灭种罪公约》两个彼此独立、性质不同的方面, 并将俄罗斯提出的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异议分别归入其中。俄罗斯提出的第3、4、5、6项初步反对意见与争端的第一个方面有关, 均未获法院支持。俄罗斯提出第2项和第3项反对意见与争端的第二个方面相关。尤其是获得法院支持的第2项反对意见, 按照法院提出的判定属事管辖权的一般标准, 就该案而言, 法院需要判定俄罗斯使用武力以及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是否违反《灭种罪公约》第1条和第4条, 并审查乌克兰提出的第2项指控和俄罗斯的异议是否属于《灭种罪公约》第9条“争端解决条款”的范围。最终

① 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Somalia v. Keny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7, pp. 47–50, paras. 125–133.

②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I. C. J. Reports 2023, p. 370, paras. 70–71.

③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I. C. J. Reports 2023, pp. 370, 372–373, paras. 70–71, 80–81.

④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Xue, I. C. J. Reports 2023, p. 394, para. 12.

⑤ 俄罗斯提出6项关于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的初步反对意见: (1)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不存在《灭种罪公约》项下的“争端”, 国际法院因而无管辖权; (2) 国际法院缺乏属事管辖权; (3) 乌克兰在诉状中提出的新诉求不具可受理性; (4) 法院判决可能不产生实际效果, 因而乌克兰的诉求不具有可受理性; (5) 乌克兰要求法院裁决其行为符合《灭种罪公约》的诉求不具有可受理性; (6) 乌克兰的申请构成程序滥用, 不具有可受理性。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Submitt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 October 2022. 法院对于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仅支持了俄罗斯的第2项初步反对意见。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24, pp. 57–58.

法院假设俄罗斯的行为是为履行《灭种罪公约》且违反国际法，此处的“国际法”是指国际法上与使用武力有关的原则和规则，而非《灭种罪公约》。据此乌克兰的指控不受《灭种罪公约》的调整，法院不享有属事管辖权。而为论证争端的存在和法院对本案具有属事管辖权，部分国家的参加声明忽略了管辖权和案件实质问题的区别，^①显然超出了对《灭种罪公约》第 9 条作出解释的范围，此种情况下第三国在管辖权阶段的参加应是不可受理的。

（四）“判决中之解释”对参加国具有同等拘束力

《规约》第 63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如该国行使参加权利，“判决中之解释”对该国具有同等拘束力。条约解释型参加的参加目的是允许某一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在其不作为当事国的诉讼中向法院提出对条约条款的解释。法院在“南极捕鲸案”中明确表示，“鉴于根据《规约》第 63 条参加诉讼仅限于就有关条约的解释提出意见，不能允许参加国涉及法院正在审理案件的任何其他方面，而参加国并没有成为诉讼的当事国，参加诉讼不会影响争端当事国的平等”。^②就参加国与当事国的关系而言，参加国不能也不应被视为当事国，参加国不享有《规约》和《规则》赋予当事国的任何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规约》第 63 条的“拘束力”（binding）不同于《规约》第 59 条和第 60 条的“既判力”（*res judicata*）。总体上，既判力原则对当事国兼有结论性效力与排除性效力，结论性效力是指对相同当事国就同一事由的判决是终局的，且判决仅对当事国有拘束力，而排除性效力仅在当事国之间排除诉因，而不适用于排除前诉的法律或事实争议。^③法院对案件的决定载于判决的“执行条款”（the operative clause）中，为了确定既判力所涵盖的内容，可能确有必要根据判决中阐述的判理来确定执行条款的含义。^④

“判决中之解释”既可能指判决的执行条款，也可以延伸到判决的说理部分。按照“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对两类条约解释的区分，《规约》第 63 条具有“拘束力”的“解释”更应指向条约解释作为争端主题事项的这类情况。这一立场也伴随着如何界定受拘束的“解释”内容和范围这一问题。在“对利吉坦岛和锡帕登岛的主权案”（*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中，法院结合《规约》的起草文本得出结论认为，对第 62 条的“判决”一词应作广义理解，即依据《规约》第 62 条申请参加国家表明的可能受判决影响的法律性质之利益不限于判决主文（*dispositif*），还包括构成判决主文的必要步骤。^⑤本文认为，整体上对第三国有拘束力的“解释”应限于诉讼相关阶段与争端主题事项相关的判决主文和构成主文的必要步骤内，而仅作为某一推理要素存在的条约解释不应被认定为有拘束力。

《规约》第 63 条旨在促进法律的统一，^⑥为保证一贯地解释有关条约，法院不愿忽视其在先

① 例如 2022 年 12 月 7 日提交的加拿大和荷兰联合申请的第 9 段，2022 年 10 月 13 日提交的卢森堡参加申请的第 19 段至第 46 段，2022 年 12 月 13 日提交的卢森堡参加申请的第 13 段至第 33 段等。

②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I. C. J. Reports 2013, p. 9, para. 18.

③ See Niccolò Ridi, “Precarious Finality? Reflections on Res Judicata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ase”, (2018) 31 (2)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3, p. 385.

④ See *Question of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Nicaragua and Colombia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Nicaraguan Coast (Nicaragua v. Colomb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6, p. 126, para. 61.

⑤ See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 Malaysia)*,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1, p. 596, para. 47.

⑥ See Robert Kolb, *The Elgar Compan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Edward Elgar, 2014), p. 366.

前的案例中所作条约解释，参加国至少在法院的嗣后诉讼中不能就有关条约提出不同的解释。^①但“判决中之解释”对第三国的“拘束力”是相对的，判决中有关条约的解释对第三国具有同等拘束力应以对当事国产生拘束力为前提。如加亚在“南极捕鲸案”中所述，《规约》第 63 条规定判决有关条约的解释将对参加国具有同等拘束力。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参加国受拘束，这样的规定是不平衡的，会不适当地惩罚参加国。第 63 条第 2 款规定参加国受到“同等”拘束，就条约解释而言，参加国对当事国有拘束力，当事国对参加国也有拘束力。^②亚伯拉罕指出，判决解释对第三国产生的拘束力不应超过判决对当事国产生的效力，否则这将导致一个明显荒谬或不合理的结论，即《规约》第 63 条第 2 款本身也反对给予第三国施加对当事国没有施加的义务。^③《规约》第 63 条第 2 款的目的是为界定或修改判决解释对案件当事国的拘束力，而是该条款已经预设判决拘束力的存在，该条款的本意也并非创设判决拘束力。^④

法院还需审查参加国是否存在条约保留等对抗判决同等拘束力的法律事实。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的管辖权阶段中对美国的参加提出异议，法院认为美国对《灭种罪公约》第 9 条所作保留目前仍然有效，该项保留使美国不受《灭种罪公约》第 9 条约束。在涉及《灭种罪公约》第 9 条和法院需据此确定属事管辖权的管辖权阶段，法院判定美国因为对第 9 条所作保留，所以不能提出与法院根据第 9 条行使属事管辖权相关的《灭种罪公约》其他条款的解释，从而最终认定美国在管辖权阶段的参加声明是不可受理的。^⑤因此，法院必须在管辖权阶段就《灭种罪公约》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美国因保留而对管辖权阶段的参加不具法律利益。^⑥同理，在管辖权阶段，如果参加国已对有关公约的争端解决条款作出保留，由于该项保留使此条对参加国不具效力，那么参加是不可受理的。

三 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程序性规则

作为国际法院的附带程序之一，法律利益型参加和条约解释型参加的程序性事项集中规定在

- ① 国际法上虽不存在“因循先例原则”，但国际司法机构为维系其合法性权威，其条约解释通常具有连贯性和“判理稳定性”，而司法裁决实际上已产生先例效力。参见王涛：《国际法院司法裁决的先例效力》，载《人民法院报》2020 年 9 月 4 日，第 8 版；张乃根：《试析条约解释的“判理稳定性”——以国际法院和世界贸易组织晚近案例为例》，载《荆楚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106—120 页；张乃根：《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判理或先例之辨——兼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48—54 页；师华：《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研究》，载《理论探索》2018 年第 4 期，第 115—121 页。
- ②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Declaration of Judge Gaja, I. C. J. Reports 2014, pp. 41–42.
- ③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Judge Abraham, I. C. J. Reports 2023, pp. 385–386, para. 3.
- ④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Judge Abraham, I. C. J. Reports 2023, p. 386, para. 6.
- ⑤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I. C. J. Reports 2023, p. 377, paras. 96–99.
- ⑥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Judge Abraham, I. C. J. Reports 2023, p. 385, para. 1.

《规则》第三章“诉讼程序”项下的第四小节“附带程序”中。《规则》对于条约解释型参加的规定有第 82 条、第 83 条、第 84 条和第 86 条，其中第 82 条和第 86 条是专门针对条约解释型参加的规定。

（一）第三国提出参加声明应符合时限要求

修订后的《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规定，第三国行使《规约》第 63 条赋予其参加诉讼的权利时应尽快提交参加声明，并将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提出参加声明的最后时限变更为“最迟不得晚于辩诉状（counter memorial）的提交日期”。当法院准许新的书面程序或提出反诉，新增的《规则》第 82 条第 2 款规定第三国应尽快提交参加声明，最迟不得晚于最后一份书状（written pleading）的提交日期。若第三国在初步反对意见阶段提交参加声明，新增的《规则》第 82 条第 3 款要求第三国应尽快（as soon as possible）提交参加声明，最迟不得晚于法院规定的就初步反对意见提交书面意见的日期。

法院在判定“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的管辖权阶段提交的参加声明是否符合《规则》第 82 条的要求时，班达里（Bhandari）法官认为，本案史无前例地有 33 个国家提交了参加声明，出于实际考虑应相对严格地解释“尽快”一词。“尽快”一词也是《规则》第 82 条的一项关键要求，如果对“尽快”一词重视程度不够，不断提交的参加声明会给法院的审判效率和资源造成巨大压力，从而拖延案件审理进度。^①

（二）第三国提交的参加声明应符合形式要求

修订后的《规则》第 82 条第 5 款规定，参加声明应说明案件情况和所涉及的公约，并应包括：（a）声明国认为自己是公约缔约国的详细依据；（b）确定声明国认为解释有问题的公约的具体条款；（c）说明声明国所主张的对这些条款的解释；（d）一份支持文件的清单，并应附上这些文件。

对于第 82 条第 5 款 a 项，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参加国承担证明自身是公约缔约国的证明责任，参加国只需达到“自认为”的证明标准即可。例如巴勒斯坦宣告参加“南非诉以色列案”时，只需“自认为”是《灭种罪公约》的缔约国即可，由法院最终决定巴勒斯坦的参加声明是否可以受理。对于参加声明是否符合第 82 条第 5 款 b 项和 c 项的要求，法院在“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下称“冈比亚诉缅甸案”）中清晰地界定了两项条款的“边界”，法院认为上述两条款并不要求参加国另外表明其主张的条约解释涉及主诉讼程序中当事国之间有争议的条款解释，同时认为第 82 条第 5 款 c 项也并未要求对有关条约的解释必须符合特定标准。^② 关于第 82 条第 5 款 d 项，奥地利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中提交的参加声明没

①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Judge Bhandari, I. C. J. Reports 2023, p. 401, para. 5.

② 原《规则》第 82 条第 2 款 c 项修订后现为《规则》第 82 条第 5 款 c 项。Se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3 July 2024, para. 35.

有附上支持文件的清单，立陶宛提交的参加声明则明确表示“其参加声明仅依据现有文件”，法院最终认定该案提交的所有参加声明均符合《规则》第82条第5款d项的要求。^①无论是奥地利参加声明的“形式瑕疵”，还是仅依据现有文件而并无其他具体文件支持的立陶宛参加声明，均已满足《规则》第82条第5款d项的实质要求。

除此之外，《规约》第63条第1款规定，凡涉及诉讼当事国以外国家为缔约国的条约解释问题时，书记官长应立即通知各该国家。《规则》第43条第1款规定法院书记官长负有通知的义务，“法院应考虑对该事项应向书记官长发出何种指示”这一措辞表明书记官长不应擅自采取行动，而应接受适当的指示。此类通知不应被视为是纯粹的行政事项，因为需要对案情进行初步分析后作出涉及条约解释是否实际上“有问题”的决定，此类决定具有司法性质，必须由法院作出决定。^②关于应作出此类通知的时间，《规约》第63条要求书记官长应“立即”（forthwith）通知有关国家。如佩特林（Petrén）法官在“审判巴基斯坦战俘案”（*Trial of Pakistani Prisoners of War*）的反对意见中提出，按照《规约》第63条，书记官长应毫不迟延（without delay）地通知两项文书的缔约国。^③然而该案中实际并未发出该项通知，甚至多数法官反对在对临时措施作出裁定前发布通知。“洛克比空难事件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案”（*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1971 Montreal Convention arising from the Aerial Incident at Lockerbie*）^④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案”（*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⑤中均出现了发出通知的日期与法院公开审议临时措施的日期仅间隔1天的情况。根据修订后的《规则》第82条第6款，一国若“自认为”是涉及解释问题公约的缔约国，即使并未收到书记官长依《规约》第63条第1款所作出的通知，仍可提出参加声明，故而不应将参加国收到书记官长所作通知视为参加的一项要件。

（三）条约解释型参加国享有有限的程序性权利

1. 指派专案法官的权利

“南极捕鲸案”中涉及到新西兰的参加是否影响澳大利亚依据《规约》第31条第2款指派专案法官的权利。法院认为，澳大利亚选派专案法官参与案件是在日本讨论当事国双方平等时提出的。新西兰的参加并不会赋予诉讼当事国的地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能被视为是《规约》第31条第5款所指的具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当事方，因此法官中有新西兰国籍的审案法官并不会

① 原《规则》第82条第2款d项修订后现为《规则》第82条第5款d项。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I. C. J. Reports 2023, pp. 363–364, para. 39.

② See Philippe Couvreur, “The Registra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tatus and Functions”, in Carlos Jiménez Piernas (ed.), *The Legal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European Community Law: A Spanish Perspective* (Martinus Nijhoff, 2007), p. 10.

③ 国际法院于1973年12月15日裁定将“审判巴基斯坦战俘案”移出法院审理案件清单。佩特林是针对法院作出的临时措施命令提出反对意见。See *Trial of Pakistani Prisoners of War (Pakistan v. India)*, Interim Protection, Order of 13 July 1973,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Petrén (translation), I. C. J. Reports 1973, p. 335.

④ 在该案中书记官长于1992年3月25日通知《蒙特利尔公约》的其他缔约国，法院于1992年3月26日进行审议临时措施的口头听证。

⑤ 在该案中书记官长于1998年4月6日通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其他缔约国，法院于1998年4月7日进行审议临时措施的口头听证。

影响澳大利亚根据第 31 条第 2 款选派审理此案的专案法官的权利。^① 在“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 中，对于马耳他以非当事国身份申请参加该案是否享有指派专案法官的权利，法院认为，马耳他提名专案法官的信函所涉及的事项不属于《规约》第 31 条的范围，根据《规约》第 62 条提出参加请求的国家，除提出参加申请并获准参加诉讼外并无其他权利，而且不能确立参加国与案件有关的任何地位。故而法院认定，在审议并对马耳他的参加申请作出裁定前，并不满足《规约》第 31 条的适用条件，法院不能在当前诉讼阶段审议马耳他信函所指指派专案法官的事项。^② 申言之，条约解释型参加国和非以当事国身份参加的法律利益型参加国均不被赋予当事国地位，非当事国身份的参加不享有指派专案法官的权利。

2. 对参加声明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三国基于条约解释的参加声明被判定为可以受理之前，根据《规则》第 84 条第 2 款，如在《规则》第 83 条规定的时限内，若有当事国对参加声明的可受理性提出异议，法院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听取参加国和当事国的意见。原则上，若有当事国明确反对第三国的参加，国际法院可举行公开听证会。例如在“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 中，因萨尔瓦多明确反对尼加拉瓜依据《规约》第 62 条申请参加，法院举行了数周的公开听证。^③

修订后的《规则》第 86 条第 2 款，将条约解释型参加的第三国“应当”（shall）在口述程序中提出意见变更为“除非法院另有决定”，参加国“可以”（may）在口述程序中就参加事项提出意见。换言之，法院裁定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可受理之后，参加的第三国仍可以在口述程序中提出意见，或者提交书面意见。在第三国大规模宣告参加的情况下，若按照修订前的《规则》第 86 条第 2 款，获准参加诉讼的参加国均享有在口述阶段提出意见的权利，可能会减损国际司法程序的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修订后的《规则》第 86 条第 2 款将分配司法资源的主动权重新收归法院，由法院决定哪些国家可以出庭参与口述程序。这样既能筛选因政治目的而选择参加的国家，又会减轻法院的司法负担，从而将口述阶段的司法资源更多放置于审理当事国间的法律或事实争端。

四 对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的再认识

在国际法院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中，主要包括原告国、被告国、参加国和法院 4 方法律主体，第三国参加将影响原告国与被告国、当事国与参加国、法院与参加国 3 对法律关系。故而，若想全面认识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应综观受第三国参加影响的 4 方法律主体和 3 对法律关系。

①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I. C. J. Reports 2013, p. 9, para. 21.

② See *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1, p. 6, para. 8.

③ See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0, p. 99, para. 17.

（一）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不应逾越条约解释范围

国际法院的法官坎萨多·特林达德（Cançado Trindade）指出，在国际法院的当代司法诉讼中逐步接受第三国参加非常有助于实现更加协调一致的国际法律秩序，特别是在事关集体利益或共同利益以及集体保障的情况下，第三国参加程序为法院的审查和推理提供了更多要素，可以促进国际法本身的逐步发展。^① 早在起草《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时，法学家咨询委员会就曾强调，第 63 条的机制能非常迅速地达成对多边公约的“一般解释”，并与公约的特性保持一致。^② 《规约》第 63 条承袭自《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 63 条，从起草历史可知，第 63 条的目的是通过使更广泛的非案件当事国参与解释行为，以此承认法院判决达到的“解释性效果”。^③

从参加目的看，条约解释型参加的目的限于在当前诉讼阶段就案件所涉条约解释提出意见，即第三国条约解释参加仅为法律解释的统一。以“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为例，法院认为，有争议的参加声明一般只涉及《灭种罪公约》的条约解释，法院将不予考虑当事国之间是否存在争端、证据、事实或《灭种罪公约》在本案中的适用问题，而且根据《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 c 项所载的“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法院只在涉及《灭种罪公约》的相关条款解释时才予以考虑。^④ 国际法院副院长格沃尔吉安（Gevorgian）也同意法院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的管辖权阶段不受理参加国超出解释《灭种罪公约》第 9 条这一有限范围的主张。^⑤ 薛捍勤的反对意见则更进一步说明，几乎所有声明国均要求法院作出两项裁决，但声明国不是寻求救济的适格主体，参加声明所涉部分问题属于案件实质问题，只能由当事国提出，或只能由原告国在诉状中提出。薛捍勤认为法院不予考虑超出条约解释范围这一预防措施不足以阻止参加国涉及案件的实质问题。^⑥

本文认为，若参加国的参加目的不易分辨时，可从参加声明的高频次引用内容和引用用意加以推断。条约解释型参加的程序设计充分显示，虽然只有当事国受案件判决结果的约束，但实际上当法院解释和适用条约条款时，其他国家也会受到案件判决的影响，非该案当事国的其他国家、在其他诉讼程序中的法院以及其他的国际性法院或法庭均可能采用该解释或受其影响。^⑦ 譬如对“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参加声明引用内容进行法律实证分析可见，引用前 5 位的均是

①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Cançado Trindade, I. C. J. Repots 2013, pp. 39 – 40, paras. 75 – 76.

② See *Procès-Verbaux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Van Langenhuyesen Brothers, 1920), pp. 745 – 746.

③ See Alina Miron and Christine Chinkin, “Article 63”, in Andreas Zimmermann *et al.*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2019), p. 1743.

④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I. C. J. Repots 2023, p. 374, paras. 84 – 85.

⑤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Vice-President Gevorgian, I. C. J. Repots 2023, pp. 383 – 384, paras. 8 – 9.

⑥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Xue, I. C. J. Repots 2023, p. 398, paras. 23 – 25.

⑦ See Alina Miron and Christine Chinkin, “Article 63”, in Andreas Zimmermann *et al.*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2019), p. 1743.

国际法院先例。^①虽然引用先例和遵循先例有本质不同，法院引用可能会遵循、承认、区分或否认先例，但弄清先例是如何被引用以及为什么被引用，可以解释国际法院的内部运作机制以及国际法院实践的新发展。

在各参加国的参加目的混杂或模糊不清时，可根据参加国引用先例的频次与引用目的、各参加国的合作程度以及某些参加国之间是否聚类形成“群组”等实证分析结果推断参加目的。若参加国的参加声明多引用法院先例，且引证其对争议条约条款的解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参加目的是为促进法律解释的统一。参加国的参加目标是说服法院采纳其对争议条约的解释，而援引法院先例是更易达成这一参加目标的诉讼策略之一。正如科恩（Cohen）所指出的，依据法院先例进行论证可能会使法院更倾向于参加国所持立场。^②若某一参加国高频次援引权威公法学家学说、政府官方声明等非司法裁决，并借此提出自身的法律主张而非旨在解释争议条约条款，则该参加国不乏有策略性地利用参加程序之嫌，^③其参加声明应是不可受理的。若各参加国之间的合作程度较强，法院则应重视薛捍勤提出的第三国参加的客观性与中立性。

（二）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不应损害当事方平等

条约解释型参加有两点限制：一是参加国不成为案件的当事方，二是参加国根据判决结果所承担的义务不得比案件当事国所承担的义务更重。^④

当事方平等原则作为体现国际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原则之一，一般认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静态意义上的平等，是指当事方的双方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在立法上的平等分配；二是动态意义上的平等，是指法院或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给予各当事方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主张、意见和证据给予同等尊重和关注，故而是否实现动态的平等需要通过司法实践去评价。^⑤如前所述，法院在“南极捕鲸案”中已证实，相较于当事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程序中的参加国不对法庭的组成享有权利。在诉讼程序启动后，例如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法院也会根据当前诉讼阶段判定参加声明是否可受理或是否开庭审理参加声明。而且法院出于对司法程序效率价值的考虑，修订后的《规则》规定了参加国提交参加声明的最后时限，并且要求严格解释《规则》第

① “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参加声明中，引用前5位的国际法院先例是：（1）“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2022年3月16日的临时措施法院命令（30国引用）；（2）2007年“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判决（30国引用）；（3）1924年“马弗罗玛提斯巴勒斯坦特许权案”（*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判决（28国引用）；（4）2022年“冈比亚诉缅甸案”初步反对意见判决（28国引用）；（5）1951年“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保留的咨询意见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27国引用）。See Kyra Wigard, Ori Pomson and Juliette McIntyre, “Keeping Sco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ventions in *Ukraine v. Russia*”, (2023) 14 (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05, pp. 319–320.

② See Harlan Grant Cohen, “Theorizing Preced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Andre Bianchi et al. (eds.),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73.

③ “战略诉讼”（strategic litigation）是一个经常使用但无明确定义的概念，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普遍共识为法律主体参与法律程序以求进一步实现超越于特定法律程序的结果，旨在促进实现法律、政治和社会变革等更广泛的目标。See Florian Jeßberger and Leonie Steinl, “Strategic Lit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Facilitating a View from Within”, (2022) 20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379, pp. 383–384.

④ See Juan José Quintana, *Litig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ractice and Procedure* (Brill Nijhoff, 2015), pp. 955–958.

⑤ 参见王林彬：《国际司法程序价值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82 条项下的“尽快”一词，因此，在具体诉讼程序中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很难会直接影响当事国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

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中，俄罗斯以参加将会损害当事方平等和良好司法为由提出异议，但并未获得法院的支持。^① 格沃尔吉安^②和薛捍勤^③两位法官虽然同意法院否认俄罗斯就参加国的政治动机和滥用程序提出异议的立场，但均认为，对于参加国实际上采取了偏向乌克兰一方的“积极合作”的诉讼策略，法院并未完全解决其对当事方平等和良好司法造成的负面影响。格沃尔吉安更进一步主张，对于初步认为可以受理的参加声明，法院应进行更实质性分析，判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损害当事方平等原则，在此基础上，最终决定是否可基于良好司法原则而拒绝受理。^④

（三）国际法院应是受理第三国参加的决定主体

条约解释型参加通常被视为条约缔约国的权利，法院在裁判参加声明的可受理性时，当事国对第三国参加的反对属于法院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⑤ 在“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中，法院曾对其裁定第三国参加的权限进行过法理分析，即法院在审理参加程序上的权限同其受理和裁定提交至法院的争端的权限一样，不源自案件当事方的同意，而是源自当事方成为《规约》缔约国时，对法院行使《规约》赋予权力的同意。^⑥

在 7 个涉及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案件中，法院对 3 个案件的裁决结果与当事国的态度明显相左。（1）“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当事国均表示支持，法院判定参加声明是不可受理的；（2）“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案”：乌克兰表示支持，俄罗斯表示反对，法院判定除美国的参加声明外，其余 31 份参加声明是可以受理的；（3）“冈比亚诉缅甸案”：冈比亚表示支持，缅甸表示反对，法院判定马尔代夫的参加声明与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瑞士和英国等 6 国联合参加声明当中未超过条约解释范围的部分是可以受理的。

在“冈比亚诉缅甸案”和“南非诉以色列案”等案中，国际法院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诉讼程序的双边性质与实体问题的多边性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鉴于程序性规则可以引导或塑造实体性

① “the equality of the parties”译为“当事方平等”，“the goo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译为“良好司法”，当事方平等被视为良好司法的核心内容。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I. C. J. Reports 2023, pp. 366 – 367, paras. 47 – 53.

②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Vice-President Gevorgian, I. C. J. Reports 2023, pp. 381 – 383, paras. 2 – 7.

③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Xue, I. C. J. Reports 2023, pp. 398 – 400, paras. 26 – 29.

④ Se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dmissibility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rvention, Order of 5 June 2023, Declaration of Vice-President Gevorgian, I. C. J. Reports 2023, p. 383, para. 6.

⑤ See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a/Malta)*,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4, p. 28, para. 46.

⑥ See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 Honduras)*,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0, p. 133, para. 96.

规则的适用,在涉及共同利益的案件中,若预设程序性规则与实体性规则是积极关系,包括第三国参加程序在内的程序性规则应以反映并保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式加以解释和发展。^①《规约》第 30 条赋予法院根据其职能订立规则的权力,尤其是法院订立程序性规则的权力。一方面,为避免法院所遵循的程序性规则与保护公益的实体性规则脱节,法院有意规定更为透明的、包含更多参加机会的程序性规则,以求反映程序性规则的“多边化”趋势。法院修订《规则》第 81 条、第 82 条和第 86 条等有关第三国参加的程序性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保护公共利益,增强法院的合法性。^②另一方面任何程序性规则的扩展都可能冲击国际法院的双边争端解决机制,可能会因保护“公益”目标与国际法院双边争端解决机制产生不兼容,进而导致缔约国不愿意选择一个不能保障其程序自主的国际司法机构。虽然对国际法院程序性规则的解释与适用反映了“公益化”趋向,但国际法院保护共同利益这一政策选择应以良好司法为前提,并应具有合法性。^③

五 结论

迄今为止,国际法院涉及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的 7 例案件中,以“冈比亚诉缅甸案”为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反映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早期实践,第二个阶段反映“公益化”趋向的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新实践。

在有关条约解释型参加的早期实践中,法院一方面基于第三国参加的附带程序属性,裁定参加声明的可受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规约》第 63 条的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析出 3 项裁定参加声明可受理性的具体标准,即宣告参加时参加国应“自认为”是主程序争议条约的缔约国,参加目的应限于就条约解释提出意见的有限范围,“判决中之解释”对参加国具有同等拘束力。除此之外,参加声明还需满足修订后的《规则》第 82 条的时限要求与形式要求。在条约解释型参加的后一阶段中,法院正面临着参加国以积极合作的诉讼策略大规模宣告参加的复杂情况。一则参加国合作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二则需要重新研判参加国以积极合作的诉讼策略大规模宣告参加是否有损当事方平等和良好司法等国际司法基本原则,三则国际法院本身需要平衡实体问题的“多边”趋势与程序性规则“双边”性质的紧张关系。

就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所涉权利而言,参加国提交参加声明的内容应限于条约解释,并享有有限的实体与程序性权利。就参加国与当事国的关系而言,法院应对各国的参加声明进行更为实质的判断,不排除以损害国际司法基本原则为由,判定参加声明不可受理。就国际法院这一决定主体而言,虽然修订有关第三国参加诉讼的程序性事项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法院争端解决机制的

① See André Nollkaemper,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The Intersection of Substance and Procedure”, (2012) 23 (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69, p. 770.

② See Paula Wojcikiewicz Almeida,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roced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Community Interests: The Role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Patrícia Galvão Teles and Manuel Almeida Ribeiro (eds.), *Case-La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tributions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Brill Nijhoff, 2019), pp. 94 – 95.

③ See Paula Wojcikiewicz Almeida,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Regulation in the Common Interest: The Role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and *Amicus Curiae* before the ICJ”, (2019) 18 (2)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163, p. 188.

“公益化”趋向，但国际法院作为国际司法机构，为增强机构运行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仍应将公正和效率作为裁定第三国条约解释型参加可受理性所需考虑的优位价值。

Study on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by Third State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e Zhipeng and Zhou Meng

Abstract: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by third States is governed by Article 63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Article 82 of the Rules of Court. In the six cases in which the Court has ruled on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by third States, the Court has ruled on the admissibility of declarations mainly on the basis of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incidental proceedings, as well as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63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cluding the status of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th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limi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given by the judgment will equally bind upon third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declarations were subject to the formal and time-limit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82 of the revised Rules of Court. Proceeding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which a third State intervened included four legal subjects, namely the Court, the Parties and the third States, and involved three pairs of legal relations: the Claimant State and the Respondent State, the Parties and the third States, the third States and the Court. The purpose of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by third States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vention in dispute in the main proceedings, and when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vention by third States was difficult to discern, it c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content of high-frequency citations in the declarations and the intention of such citations. In the recent litigation practices, the Court should make a more substantive judgment on declarations filed by third States, especially in cases where third States have adopted an active strategy of cooperation and where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by third States do not infringe the equality of the Parties and the goo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n the whole, the attitude of the Parties towards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was an important but not decisive fact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was still the deciding body. On the one hand, the Court's revision of the procedural rules on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was in line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 approach,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value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international justi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vention Proceeding,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Incidental Proceeding, Admissibility

(责任编辑: 郝鲁怡)